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金雁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金雁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 金雁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7 -5060 -7045 -4

I. ①苏… II. ①金… III. ①史评—苏联 IV. ①K51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782 号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SU'E XIANDAIHUA YU GAIGE YANJIU)

作 者: 金 雁

责任编辑: 邹绍荣 辛亚梅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3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7 -5060 -7045 -4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再版序

本书1999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初版，收集了笔者13篇俄国—苏联史研究论文，早期的6篇在学术刊物上初次发表时苏联还存在，其中最晚的一篇初次发表在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距今也已16年。如今初版书已经很难找到。此外，这些文章初次多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苏联史研究刊物上。这些发行量小，且当时并未实行统一刊号的刊物往往被视为“内部发行”刊物。这也是它们的言论尺度较大、现在一般期刊索引上查不到的原因之一。照现在的规定，它们有“非法出版物”之嫌。鉴于上述两个原因，不断有朋友们建议再版。

如今回头看，当年的这些论述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随着“剧变”以后档案的大量公布，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料早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认识也深化了。当年我为澄清苏联所谓的“富农”问题做了大量的考证，并且为批判斯大林而正面引述了不少列宁的话。但现在看来，当时所谓的消灭“富农”其实就是要剥夺农民，而且始作俑者无疑就是列宁。早在1902年，列宁就曾明确地主张，在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对付农民（他甚至没提“富农”）。他批判那种把工农都列为“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提法，认为它对“小生产者的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他还引证《共产党宣言》

说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而他们又占了俄国人口大多数。如果他们支持我们，“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但正因为这不可能，所以在俄国只能搞“专政”，不能搞民主，因为“多数决定”的民主制对少数的工人阶级是不利的。^①

马克思是从来没有这种主张的。尽管马克思也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但从来只是在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尚未实现普选权，要么还是专制制度，要么实行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无产阶级还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以暴抗暴，通过“内战”求解放，而设想的一种战时状态。“专政（dictatorship）”一词的原意就是共和国在战时紧急状态下临时中止共和，实行有时限的军事独裁。马克思也的确（如列宁引述的）对农民有反感。但他由此得出的主张只是，在农民社会里没有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只有资本主义发达、无产阶级占多数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他从来没有想过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付农民，以少数强制多数就范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

但列宁就是这样想的。无怪乎革命后，列宁即明确指出要建立少数强制多数就范的体制：“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②直到1920年，列宁还在一次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团的内部谈话中宣称：“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215-216，230-23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页。

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①

尽管列宁在公开场合讲过不少好听的话，但无疑上述没有发表的言论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斯大林时代出现那样的场面就毫不奇怪了。

本书还收入了几篇讨论“转型危机”的文章，但主要讲的是沙俄时代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后来读者反响最强烈的“后苏联时代”转型研究，那时还不是我主要关注的对象。只有一篇讲述俄苏历史上频繁改地名现象的文章，写于苏联解体前夕。此后20多年间由“剧变”引起的又一波改名潮过去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东欧国家的地名渐趋稳定，尤其是民主政治走上了正轨的一些国家已经不在乎“城头变幻大王旗”。像前东德与西德统一后，除“卡尔马克思城”恢复原名开姆尼茨外，其余许多城市中无数“马克思大街”、“倍倍尔大街”、“蔡特金广场”之类的共产党时期地名都原封不动。唯有几乎没有出现民主化的中亚国家土库曼（现在叫土库曼斯坦）改名越来越频繁，不但大量俄语地名改成突厥语地名，而且“以人名城”也变幻莫测。一开始许多运河、城镇、街道、院校、机场都以终身总统尼亚佐夫命名，后来尼亚佐夫学了“避讳”这一手，不让人直呼其姓名，而自称土库曼巴什（“土库曼的主人”）。于是这些地方又纷纷改名土库曼巴什，甚至改用总统之父、之母的名字来命名。这造成该国如同斯大林时代那样“没有一本耐用的地图”，也算是那里的一景了。

除此之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绝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不再玩这一套。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却往往自作聪明。如前几年，普京政府把卫国战争时期命名的英雄城市纪念碑中的“斯大林格勒”恢复原貌。赫鲁晓夫时代曾一度因“非斯大林化”而把碑上的斯大林格勒改成该城现名“伏尔加格勒”。这其实是很无聊的，这种政治挂帅篡改历史的做法恰恰是斯大林

^① 列宁：《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俄文发表于//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4г. №11.

遗风未除的表现。二战时，该城被列入英雄城名录，名为斯大林格勒，正如一战时它叫察里津一样，是历史的事实。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能因批判斯大林就改叫伏尔加格勒战役。如今巴黎、伦敦都还有纪念这次战役的斯大林格勒广场，这当然也不是在纪念斯大林。叶利钦时代列宁格勒改回旧名圣彼得堡，但二战英雄城碑刻上的城名并没有改，这才是“剧变”的体现。普京无论被认为有多少“民主倒退”的嫌疑，这个做法倒是继承自叶利钦的。因为伏尔加格勒现在仍然叫伏尔加格勒，这和历史上的城名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平津战役纪念碑”或“北平和平解放纪念碑”的竖立并不表明北京已经改回北平旧称一样。可是我们媒体的有些人就大惊小怪地说，伏尔加格勒又改回斯大林格勒了，表明俄罗斯现在要重举斯大林旗帜了。这都是哪跟哪呀！

还要说明的是，我和秦晖多年来一直是合作者，但并非所有著述都两人联署，尤其在过去同一期杂志刊出我们两篇文章的情况下，编者一般都要求我们分别署名。但结集成书时，我们的出版界却不习惯搞“合集”。这就难免出现如下情况：有时在刊物上初发时署一人之名，结集成书时考虑到内容归类又放到另一人的集子中。秦晖于同年初版的《问题与主义》一书的序中就提到其中收有我署名首发的文章。本书同样也收有秦晖署名首发的文章。本来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但近来版权之说逐渐严格，为免后人不知内情者大惊小怪，我应该说明一下。夫妻之间本无需言谢，我们过去在序、跋中互相致谢也常被朋友取笑为“好玩的双簧”。不过对亲人致谢在著作界素有传统，也属于人之常情，我还是要对他说谢谢。当然更要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和编辑李烨女士，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再版。

金 雁

2013年11月于北京蓝旗营

自序

本书所收 13 篇文章，并未按常例以所述史事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我认为读者对此不难理解：这不仅是我研究苏俄历史的思路进程，也是通常人们面对一个认识对象的思维路径：人们先是急于知道“它是什么”，继而在感触之余，便要追问“它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而在对其来龙与去脉有所了解之后，就不仅会对“它是什么”的理解更进了一步，而且在这一“我思故我在”的心路中也就更能理解“我是什么”，更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存在及意义了。这也正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的目的所在。

自 1978 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 20 年。“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在“集体化—消灭富农”、政治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误”，这从 60 年代以来人们就耳熟能详的斯大林时代“三大阴影”中，前者无疑是最能反映该体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性质、最能超越“事件性”、最深地触及社会底层和民族文化深层，而又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现象。在当时（1983 年前后）为集体化前这些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过火”或“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界都是

第一次。为此不能不作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不仅涉及农村经济本身，而且涉及苏联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统计学基础的来龙去脉，涉及苏联的粮食体制、原始积累机制及相关的工业化论争等。因此这组文章篇幅都较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出这一步（当然编辑也不会选用）；而论证充分了，篇幅过长又造成刊载的困难。虽有师友同仁的支持而多得以及时间问世，但一些文章还是不得不压缩内容，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一文当时则未能发表。但是，也正因为做了充分的工作，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未过时。

俄国在传统上是个农民之国（但未必如以前所云是“小农”之国）。正如谢·尤·维特所说：“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与未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富农”问题上反映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缩影。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改革气候，批判旧体制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但那时我已感到时代要求我们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它又将向何处去。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

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黄金时代一样。在我们这里不也有为了否定“文革”而盛称“50年代黄金时代”的现象吗？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俄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公社，并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

月革命》，由此开始了对苏俄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与社会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是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自1986年起我受欧美“恰亚诺夫热”的启发，从当时在苏联尚未平反且几被“遗忘”了的恰亚诺夫等“新民粹派”入手，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苏联本国学界对恰亚诺夫等人的重新认识，则是在1988年恰氏等平反后才热起来的。当时国际上对苏俄思想的研究，“体制内”注重布哈林等非斯大林派思想家，“体制外”则注重东正教背景的“俄罗斯思想”。但我觉得，世俗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村社土壤上生长的民粹主义对俄（苏）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因文章较多，我已另辑为《人民之子与人民之父：从民粹派到布哈林的传统》一书，本书收集的仍以社会史传统（村社传统）为主线。实际上，社会史传统与思想史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今后的治学方向。

进入90年代后，国外有苏、东剧变，国内在特定的气氛下出现了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我的研究也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以前研究俄国传统及苏联体制“从何而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1917年以前俄国社会转型期危机的探讨，尤其对斯托雷平改革与1917年革命之间俄国的政治—社会演进及大众（主要是农民）与精英（主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毋庸讳言，这里有“有感而发”的冲动，但并非轻率的即兴之作，本书将“立此存照”；如果历史证明我的忧患是多余的，那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本时期我的另一研究方向当然是苏式体制“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剧变后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与此有关的许多心得已辑录我的《新俄乡纪程》一书中，本书只收集了与苏联政治进程有关的一篇。但转轨进程既远未结束，我们的研究也来日方长，相信以后会有新的心得与读者交流。

总之，我信奉“有感而发，有据而论”的研究宗旨。有感而发，即文载道义，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即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觉得

对于高谈义理的空疏之学与专事章句的诂订之学都十分“繁荣”的当下而言，以上述宗旨自警是很必要的。能做到多少，就要听凭公论了。

感谢学界前辈袁伟时教授，我们至今未见过面，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工作。没有他的热心鼓励与一再督促，就不会有如今这个集子。感谢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与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心血。对于书中的浅薄粗陋之处，我除惶恐抱愧之外，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教。

金 雁

1998年4月于京西万寿寺寓所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再版序

自序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 1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 3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 3

集体化前“富农”的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 / 10

农村“分化”的性质与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政策 / 19

20 年代苏联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 / 30

农村分化统计研究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 31

“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 36

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 42

苏联 1927—1928 年度的粮食危机 / 51

“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 51

粮食危机与“富农”问题 / 62

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 67

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 70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 77

1928—1929 年间对富农的政策 / 77

- 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 81
- 富农标准的下降与“富农”队伍的扩大 / 88
-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 95**
 - 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 95
 - “消灭富农”与全盘集体化 / 103
 - “消灭富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 114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 121

-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 123**
 - 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 123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 126
 - “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 130
 - 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 135
- 19 世纪俄国的“离土不离乡”：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 / 140**
 - “公社世界”的危机与身份壁垒 / 140
 - 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 / 144
 - 身份制的废除与“离土不离乡”的消失 / 151
- 从奇吉林到鲁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近代史的“怪圈” / 154**
 - 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 155
 - 鲁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 160
 - 鲁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 163
-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 166**
 -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 166
 - 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 / 169
 - 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 176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 185

斯托雷平改革与村社复兴运动 / 187

“分家”：瓦解“公社世界” / 188

改革的原则与特点 / 192

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 197

改革走向反动 / 202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 209

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 210

1905 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的双输之局 / 212

“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 213

“路标”改变之后：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 216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 221

“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 226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 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 230

传统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公社世界” / 232

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斯托雷平奇迹”的甜头与苦果 / 237

“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 244

1917 年革命还是“十月革命” / 249

政治风云与苏联地名学 / 254

俄国地名政治性更改的传统 / 254

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 258

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 261

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 265

第四次地名更改风潮 / 274

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 279

“富农问题”与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全盘集体化就是要将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

“富农经济”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研究农业集体化以前富农问题的关键之一，就是这里所说的“富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范畴？其社会经济地位究竟如何？

今天被汉译为“富农”的俄语词 *КУЛАК* 之原意为“拳头”，由握拳而引申出“扼门”、“吝啬鬼”、“守财奴”、“小商贩”等含义，其语感颇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大腕”之类，原本只是一句俚俗的骂人语，既无“富”、更无“农”的词义。19 世纪时该词逐渐用以称那些并无高贵身份而靠“不择手段”暴发起来的人——他们未必在农村。因而这时的文献译成汉语就会出现诸如“乡村与城市的富农阶级”^① 这样的句子。而当时若要把城里的暴发户除外的话，就需说明“这里是专门谈农业中的富农”^②。但是，生活在最下层的农民们无疑对他们的同类中出现这样的暴发户最为敏感，因此这一名词用于农村的频率逐渐增加。这使得 19 世纪 70 ~ 80 年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7 页。

② 同上书，第 353 页。